



港電詐半年近千例

近日，一名港大女學生墜樓身亡，遺書講述其生前飽受假冒官員電詐案困擾。在警方披露的諸多學生受騙案中，單宗受騙金額最高達 1097 萬港幣，涉及一名 25 歲內地碩士學生。據悉，騙徒會以冒充政府人員等方式，要求受害者提供重要資訊，以達成轉移財產的最終目的；此外，有電詐組織甚至會採用人工智慧視訊等高科技手段輔助行騙。

記者、版面編輯：鄧正弘 唐吉祥 張綺倩

大學生成重災區

■香港大學校園（唐吉祥攝）

數量居首 難以偵破

據警方統計，2024 年香港的詐騙案數目為 44480 宗，在十年間上漲 402%，占當年所有罪案的 47%（圖 1），成為所有犯罪案件之首。詐騙案造成的經濟損失在近兩年上升 89%，2024 年總額達到 91.5 億港元，其中投資詐騙和電話詐騙佔 72%。據全球反詐騙聯盟報告，2024 年全球詐騙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 1.03 萬億美元，其中亞洲地區佔三分之二。在香港，每位受害者的平均損失為 1,581 美元（約 12,337 港元）。

然而，詐騙案因其跨地域特性及不斷變化的作案手法，2024 年的破案率僅為 10.6%，創下近十年新低，遠低於同期整體犯罪破案率的 30.4%。

大學生成重災區

在一般認知中，高學歷的大學生很難與詐騙聯繫在一起，但事實並非如此。由香港理工大學與反詐騙協調中心合作進行的「大專學生詐騙認知調查」結果顯示，共 3,189 名受訪學生中，82% 的人曾遭遇詐騙，當中 6% 蒙受金錢損失，平均損失金額約為 4 萬港元。本報記者在香港恒生大學進行問卷調查，在 34 名受訪者中，76% 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或身邊的朋友曾遭遇電信詐騙，其中 11% 出現財務損失。

根據警務處今年 9 月公佈的資料顯示，香

圖 1——香港騙案數目



（來源：香港立法會網頁）

港警方僅上半年便接獲近千例大學生被騙案，最常遭遇的詐騙情節分別為假冒公安、銀行等官方機構行騙，占總數的 64%（圖 2）。其次是以高薪兼職為誘餌進行詐騙，占 38%。其餘包括限時優惠或中獎詐騙、投資詐騙、網購詐騙，分別占約兩成。

假冒官員 破綻百出

香港恒生大學的內地學生小 Z（化名）詳細地分享了自己遭遇電詐的過程。

2022 年 11 月某日下午，小 Z 被電話告知曾與新冠確診患者在一家餐廳發生過「親密接觸」，需儘快提供個人資訊，並根據指示到附近的醫療機構隔離。其後，電話另一頭的「工作人員」聲稱，相關資料曾涉一宗內地銀行卡

圖 2——2024 年騙案類別



（來源：香港立法會網頁）

詐騙案，需立刻聯絡警方。騙徒隨後冒充公安，要求小 Z 作為犯罪嫌疑人協助警方調查，並索要銀行卡號等重要資訊。

小 Z 事後反思，騙徒編造的劇情雖然有不少破綻，但自己在第一時間被對方嚇住，喪失了質疑的能力，最後落入對方的「精神控制」當中。

另一位受害者小 S 說出自己受騙的原因：「被騙原因主要是那時剛睡醒，判斷力不足。中途確實有明顯破綻，例如冒充內地警員進行調查，但一開始聯繫的卻是我的香港電話號碼。」在小 S 的分析中，這些從小比較老實的學生很害怕被扣莫須有的罪名，突然「蒙冤」，因而容易會陷入試圖自證清白的思維誤區，正中騙徒下懷。

獲取信任 AI 行騙

兩位曾經行騙但改過自新的青年，向記者講述了犯案時詐騙組織的行騙方式。當時，他們都是剛畢業的大學生，在不良朋友的介紹下與犯罪團夥產生接觸，並在對方許諾的重金誘惑下步入犯罪深淵。

該集團的行騙目標無論男女，不限年齡，截至被警方查獲時已運作超過一年，詐騙過多名本地及海外受害人，騙款總額達 3.6 億元，由虛假投資平臺轉移至海外帳戶。

作案過程中，他們會通過交友 APP 篩選出易受騙的對象，經過一至兩個星期的曖昧聊天，以推銷虛假投資的方式謀取錢財，上層還會提供大量素材，幫助他們獲取受害者的信任。受訪者透露，詐騙組織甚至會斥巨資邀請科技高手，為公司打造人工智慧視訊輔助行騙。而且作案過程沒有固定劇本，主要靠騙徒自由發揮，只要行騙成功，任何手段都可使用。

警方推反詐 APP

針對逐漸氾濫的電詐現象，香港警方已設立部門——反詐騙協調中心（ADCC），提供 24 小時防騙熱線 18222，協助市民得到即時的幫助。ADCC 亦推出手機應用程式「防騙視伏 app」，以阻擋被舉報的疑似詐騙來電及推銷電話，減少市民墮入騙徒陷阱的機會。

誰的公共空間？

從一張傾斜的長椅說起



觀察：「敵意建築」隨處可見

下班交通高峰時段，疲憊的上班族本期望能在巴士站稍作歇息，然而大老山隧道巴士站亭的座椅竟呈現明顯傾斜，市民只能勉強半倚，且缺乏椅背支撐，難以真正放鬆。類似帶有「敵意」、「驅逐」意圖的設計，近年於香港公共空間屢見不鮮。

「敵意建築」本是一種設計思維，根據相關定義，雖然該術語在名稱上帶有「建築」一字，卻不必然以建築的形式實現，更多時候，它指的是一種帶有敵意的設計手段。透過特殊的設計手段，限制使用者在公共空間中的特定行為，常見於街邊窗台上的螺栓、尖刺等形式，以硬物限制露宿者臥躺，以達到預防犯罪或維持秩序等「社會控制」的效果。

根據 2023 年政府文件統計，全港登記露宿者人數最多的地區為油尖旺區，約佔總數 34%，其次為深水埗區，約佔 19%。而在深水埗通州街公園，部分長椅中間被加裝扶手，使人無法平躺，引發社會對公共設施是否刻意排除弱勢群體的質疑。

此外，馬鞍山一帶公園外的天橋底，原本是菲律賓籍傭工假日聚集的場所，近期地面卻鋪滿碎石與尖刺物，導致他們被迫轉移至天橋上聚會；西九龍中心美食廣場亦出現傾斜的餐椅，使顧客難以久坐。這些設計表面上以「整潔」與「安全」為由，實質卻被批評為「敵意建築」。



■公園椅子中間安裝了扶手，市民無法躺臥在椅子上休息。（黃樂穎攝）



■馬鞍山公園天橋下佈滿石頭。（黃樂穎攝）

傾斜難坐的巴士站椅、公園長椅上阻人平躺的扶手、天橋底下鋪滿的尖銳碎石——這些看似「美化市容」的設計，實則是近年遍布香港的「敵意建築」。這類設計透過各種隱性手段，有意無意地限制了公眾對公共空間的使用，從深水埗公園到西九龍美食廣場，讓弱勢群體難以自在歇腳。當油尖旺區聚集全港三分之一的露宿者，公共設施卻愈發「不友善」，引發社會質疑這是以城市設計或城市管理之名「驅逐低端人口」。

支持者認為此舉能保障商家與公眾權益，反對者則痛批公共空間淪為社會排除工具。背後折射的，是城市空間管理與空間正義的深層矛盾。正如學者警告，當城市拒絕為疲憊者留下一張可安坐的長椅，我們失去的不僅是休憩之地，更是城市的人情與包容。有關「座椅傾斜度」的爭議，實為香港未來城市價值的抉擇。

記者：黃樂穎 李承晉 蔣雨軒



■政府增設「讓人歇息的欄杆」，無法讓途人安心休息。(來源：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政策：美化市容與空間治理

2025 年 3 月，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發表的有關「公共道路設施優化及景觀美化工作」討論文件中提到，政府一直推行不同措施改善市容，包括美化公共空間、改善街道設施、優化園林建築及街道景觀等，以改善行人步行體驗，提升市民的日常生活幸福，例如「可讓市民坐下歇息的欄杆」。但政府圖片卻顯示，文件中提到的這個設施既像欄桿又像椅子，難以讓途人安心休息。

對於這種公共設施帶有不良傾向的情況，有「拓展公共空間」關注組指出，這種情況發生往往取決於空間持有者和管理者對於空間定義的正當途徑的理解，「如若康文署認為球場只是用作玩樂、休憩，沒想過包容無家者露宿，他們有權要求露宿者撤出官地。」

等候公共房屋多時不果、被迫露宿街頭的陳先生則認為，政府推行政策便利市民固然好，但應更著眼關注弱勢社群：「每個人的人生都會經歷艱難時刻，我們露宿街頭都是有各種原因，這些建築原意當然是好，但政府不應該一刀切，而是要處理好根源問題。」

爭議：保障商家市民或「驅逐低端人口」

市民阮小姐亦認為，政府應該為露宿者提供一個地方：「有時候地鐵站白天天天橋底下放一堆雜物，別人經過都會覺得不是很好，政府其實可以供應更多房屋，如過渡性房屋讓他們在申請公共房屋過程中居住。」她表示這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街道市容。

本報記者曾到訪西九龍中心美食廣場了解情況，發現大部分餐椅都呈現傾斜（見下圖），當日在廣場進食的阮小姐表示：「座椅又傾斜又高，年輕人可能還應付到，但老人家一把年紀，這些座椅需要時刻借力來坐，相對地便較為危險。」她認為，市民有時候在街上長時間站立，吃飯時想「休息一下」十分正常，不必設立傾斜餐椅催促市民盡快進食完畢。

但有同時到訪美食廣場進食的劉先生，卻認為設立這些設施應看地區而定：「深水埗老人家比較多或收入水平較為低的地方，可能會有更多人霸佔餐椅休息，若發生在美食廣場之中，便會產生有食客未能找到座椅進食的現象，這些建築在某些地區而言，是對商家和食客的一種保障。」他認為「敵意建築」並不是好事，但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對於這類「敵意建築」的設計，網路輿論呈現明顯分歧。部分市民支持此類做法，認為公共長椅本就不應供人躺臥，並指出「長椅不應該讓人睡覺」和「長椅越舒適越容易吸引人聚賭」。他們主張，加裝扶手既能降低不當佔用，也有助維護市觀整潔。

然而，反對聲音則批評這類設計實為「驅趕低端人口」的手段，透過不友善的空間規劃，變相「掃除低端人口」而出現的建築，抵制低收入、低學歷和與從事低階產業的市民。有網民直言：「市民坐著也不舒服」，並質疑「聚賭者根本不受座椅設計影響」，強調賭博問題應透過政策加強取締，而非以此限制公共空間的使用。這些爭議反映出都市設計背後，對於包容與秩序的價值拉鋸。



■西九龍中心用餐區的椅子傾斜，食客無法休閒吃飯聊天。(黃樂穎攝)

深挖：空間正義與階級化城市

西九龍中心美食廣場因座椅設計傾斜而引發爭議，但該商場並非由政府持有，而是由私人房地產公司擁有。這一案例突顯出「私有公共空間」的特質與問題。一般而言，公園、廣場等公共空間由政府所有，市民可自由、免費使用。然而，「私有公共空間」則是政府透過政策鼓勵開發商提供、並由其負責營運與維護的開放區域，名義上開放給公眾無償使用，實際管理權仍掌握在私人企業手中。

在這樣的運作模式下，開發商得以對空間的使用方式施加控制，影響市民的活動自由度。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控制往往與使用者的社經地位相互牽動，加劇空間的排異與分殊，進一步凸顯空間資源分配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差異。

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榮譽教授陳丙驊電郵回覆本報記者時引用了兩項數據。根據瑞士信貸集團 2019 年的一項調查，香港人均美元百萬富翁比例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瑞士 11.8%，高於美國 7.6%。而根據香港樂施會於 2024 年的一項調查，香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比例超過 20%，超過 139 萬人，即每 5 人就有一人屬於貧窮。

陳丙驊教授指：「這些相互矛盾的數據反映了我們城市好的、壞的和醜陋的現實。對於所有香港市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籠屋、劏房等居住環境差的市民來說，在城市的公共場所幾乎找不到任何慰藉。」

土地供應不足、居住環境狹小等一直是困擾香港多年來的問題，為市民的私有空間帶來壓力，走出住所放鬆心情，公共空間的建設便變得攸關重要。陳教授指出，

香港居民在本地人均享有的開放空間不足 2.8 平方米，遠遠低於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人均 9 平方米的標準。他亦認為：「在高密度、高樓層的城市環境中，捕捉物理空間以進行『地方營造』的幾個機會變得至關重要——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地面以上還是地下、永久性還是臨時性的。如果沒有這些可供人們和人類活動使用的社交空間，發展一個公平、健康和可持續城市的目標就會淪為空洞的口號，而不是有效的城市策略。」

他又認為，如果城市中能夠增設更多優越、設計精良的公共活動場所，不僅能顯著提高各年齡層的預期壽命，還能顯著提升生活品質。如此一來，這些公共空間將更能體現香港在實現生態人文城市化方面的集體價值和願景。



■陳教授認為增設公共活動場所能提升市民生活品質。(香港中文大學陳丙驊教授網絡相片)

它山之石：公共空間有多元可能

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並非反對管理，而是希望能區分情況——對於涉及治安隱患或犯罪的群體，確實需要妥善治理；但對於普通露宿者、老人或弱勢家庭，社會理應提供人性化的庇護與支持。國際經驗顯示，城市公共設計可以在秩序與包容之間找到平衡。

新加坡的碧山—宏茂橋公園便是這一理念的具體體現。這座城市公園不僅擁有整齊的草坪與綠化帶，還設置了多種形式的座椅與公共設施：靠背長凳、低矮椅子、面向草坪的躺椅，以及沿水準臺的座位。值得注意的是，公園並未對這些停留行為設限，而是通過柔性管理與全天候開放，讓空間真正屬於所有市民。

類似思路在歐美也屢見不鮮。2009 年，紐約市政府決定關閉百老匯部分車道，改造成步行廣場。這項決策起初遭到質疑，反對者擔心交通擁堵、秩序混亂，但事實證明，將公共空間從汽車手中「奪回」後，廣場的行人活動量上升 80%，車禍事故顯著下降。市政府在廣場內設置長椅、花崗岩地面和臨時表演區，並容許街頭藝人與

小販活動，使這裏成為真正成為屬於市民與遊客的「當代公共生活舞臺」。

重慶的「背簍專線」代表了另一種思路：不是改造「物理空間」，而是調整「治理方式」。每天清晨，來自城郊的菜農搭乘地鐵進城賣菜，與上班族的早高峰重疊。管理部門沒有選擇驅趕，也沒有特設「農民休憩區」牌子，卻通過一系列細微舉措構建一個真實的「休憩之所」：提前開站，讓菜農免受日曬雨淋；劃設「背簍專線車廂」；利用市中心防空洞改造成「背簍助農空間」，創造一個以人群為中心的動態公共空間。

這些案例有一個共通點：城市公共空間的包容性並非源自昂貴的建設或宏大的規劃，而是讓人們有權在城市中「暫時停下來」，而不必因缺乏消費力或身份標籤而被排斥。這些實踐為香港提供另一種想像：公共空間不一定要成為「管理」的戰場，也可以是「接納」的容器。當城市願意為弱勢群體留下一張椅子、一塊空地、一個可以停留的角落，也就為整個城市留下了更多的人情味與韌性。

DSE (香港中學文憑試) 被視為香港中學生「一試定生死」的「遊戲」。中六生挑燈夜讀、廢寢忘餐，只為在公開試中奪得佳績，在大學聯招中有更多選擇。去年大量內地學生湧入報考香港 DSE，令應考人數急增一成，間接導致大學聯招收生競爭加劇。

記者：蔡欣琳 廖若彤

考生人數增 競爭加劇

在剛剛結束的 2025 年 DSE，根據考評局統計披露，考生人數比去年增加約一成，主要原因是其中內地學生透過不同渠道以自修生的身分報考 DSE。根據考評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24 年的報考人數為 50803 人，當中自修生人數為 7508 人，而 2025 年的報考人數為 55781 人，當中自修生人數為 10303 人。也就是說，一年間，DSE 報考人數增加了 9.8%，而自修生人數則增加 37.3%。

雖然考生人數增加，各大院校的學額並未因此而增加，導致學位競爭比往年激烈。2025 年，不少考生雖然考取不俗的成績，但仍未能順利入讀心儀科目，相比之下，2024 年考取相同成績的考生，則能較順利入讀心儀科系。2025 年，大學聯招放榜的收生分數出現了上升趨勢，部分熱門科更可用「急升」來形容。以香港中文大學最新公布的 2025 年收生分數為例，熱門科系例如法律系，2024 年的收生分數（以中位數計算）為 33。2025 年的收生分數則攀升至 36。面對突如其來的劇烈競爭，令本就面臨龐大壓力的應屆考生更加焦慮。

移民、辦學或成主因

內地考生報考香港 DSE 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三個。第一，政府近年推行「高才通」計劃，吸引內地居民來香港發展，當中不乏已組織家庭及有小孩，父母帶同孩子一起移民，導致許多內地新移民學生到香港的中學插班。第二個是，近年有內地辦學機構提供報考 DSE 服務，例如遵理學校於深圳開設分校，為內地學生提供 DSE 課程及報考服務，亦有考生透過港人子弟學校報考 DSE，如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信義學校、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及東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從去年開始合資格的中六學生可以在內地考場應考，甚至懷疑是未在香港註冊的分校，如摘星教育，亦曾製造非法報考的風波。

國際化：提升國際教育話語權

香港立法會議員及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長鄧飛曾分享文章《香港教育國際化：DSE 的未來與挑戰》提出，「DSE 應進一步國際化，以保持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競爭力。」雖然 DSE 國際化前提需跨越 4 個關卡，即考試行政後勤、認證制度、學額分配與大學招生和是否另設「IDSE」，但最終目標是朝著提升國際話語權進發。

鄧飛認為，國際化會有助提升香港在國際教育舞台的能見度與話語權，若更多海外院校承認 DSE 成績，香港學生銜接國際大學會更便利。他還提到，「擴大考生來源和市場需求可促進本地教育產業發展，帶動教



■一年一度的 DSE 被視為香港中學生「一試定生死」的「遊戲」。(圖片來源：2025 年 9 月考評局通訊)

DSE 報考人數急增



■凌同學認為唯有接受現實。(蔡欣琳攝)



■彭老師認為 DSE 國際化有正面影響，並非只有負面影響。(廖若彤攝)

材、師資與評核服務的出口，創造就業與收入」。而且，若能建立受認證的海外考點與標準化的評核框架，可提高 DSE 的認受性與專業化運作，長遠有利於考試質素的國際比較。此外，他認為國際化亦促使本地教育檢視並提升課程與評核的國際視野，從而加強學生的全球競爭力。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的彭老師認為，從正面角度看，若「國際化」是指在文憑試中增加更多具國際視野的元素，將有助提升其國際認受性，對香港學生出國升學或移民帶來直接好處。他提及，「教育作為一項產業，吸引更多不同國籍的考生參與 DSE，將刺激市場需求上升並帶動相關供應的擴展。需求增加會促使教育機構增聘教師、開發更多教材與補習資源，促進教學服務的量與質同步

提升。」長遠而言，這種需求驅動的發展有望加速本地教育服務的國際化與專業化，為香港教育市場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需考慮迫切性及本地因素

但彭老師認為，DSE 國際化存在隱憂。他說：「一個方向是提升香港文憑試的認受性，但從這個方向出發，似乎並無急切的需要。」文憑試的成績本來就已經有許多外國大學承認，許多香港中學生持有文憑試成績報考外國大學並無障礙。而且一個考試制度的本質是篩選人才，若然沒有足夠認受性，注定失敗。但縱觀 DSE 及之前的會考制度亦沒有出現類似的情況。他補充，「反而是從另一個方向出發，歡迎更多國籍的考生報考文憑試，其實有許多因素需要考慮。」彭老

師覺得首當其衝是，目前文憑試其中一個必修科目為公社科，但這個科目的核心內容和香港有關。這個科目能否保證外國學生能透徹了解課程核心內容，以及跟上進度。

實行「國際化」有階段性困難

在 DSE 國際化實行方面，目前主要困難是越來越多的非本地生參與考試，導致競爭激烈。彭老師說：「若相關的配套措施和制度建設尚未完善，這種情況導致競爭壓力過大，難以取得平衡。」

面對內地生湧港報考 DSE 的現象，本地學生不僅要應對學業壓力，還要面對升學競爭，以及大學錄取分數線逐年攀升。而這正是 2026 屆 DSE 考生凌同學要面對的問題。對於這個趨勢，他亦表示擔心影響將來升學

傳播學院舉辦中國個人資訊保護研討會

面對數據時代的挑戰，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於2025年10月2日至3日舉辦「中國個人資訊保護研討會：網路私隱與數據道德」(Symposium 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in China: Online Privacy and Data Ethics)，邀請來自內地、港澳及海外的學者、律師及業界專家出席，並透過Zoom線上同步轉播。本次研討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資助(項目編號：UGC/IIDS14/H01/24)，探討數據時代的法律、倫理與治理挑戰。

記者：蔣雨軒 甘蕊雯



■與會嘉賓與恒生大學教授合照留念。(傳播學院提供)

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教授致開幕詞，他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被數據重新定義的時代，數碼技術讓我們更緊密相連，也推動創新與發展，但同時亦帶來前所未有的法律、倫理與社會挑戰。」他強調，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個人資訊保護成為政府、企業與學術界共同關注的核心議題。傳播學院院長曹旨言教授在歡迎辭中提出：「傳播教育工作者及媒體從業人員應具備專業判斷力與倫理意識，理解發佈與使用資訊對個人與社會的影響。」而擔任主題演講的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洪延青教授作為參與國家多項相關規範性文件的制定者，針對中國個人信息保護與數據安全立法與監管的重點變遷進行了梳理，他以陸續出台的《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為核心，特別提出：「以安全評估、個人信息保護認證到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的三種合規路



■與會嘉賓與恒生大學教授合照留念。(傳播學院提供)

徑，作為數據出境的規範」，他也提及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如何進行風險治理，特別是《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對於內容安全、無害性、準確性的要求以及更加開放的數據安全新理念。

研討會第一天的議程分為三個主題板塊：第一場「數據跨境傳輸與國際經驗」，由世新大學吳永乾講座教授主持，討論包括中國數據

出境法律體系、跨境流動痛點及國際治理模式；第二場「個人資訊保護的權利與權力」，由香港恒生大學趙應春教授主持，聚焦個人資訊處理法律依據、數字身份認證及公民網路設備使用資訊的法律挑戰；第三場「人工智能、演算法及人臉識別的規制與道德」，由恒生大學陳智傑博士主持，探討AI產業創新、演算法規制與個人資訊保護的倫理問題。各場次均

安排了專題報告與討論，與會者就法律制度、技術治理及倫理教育展開深度交流。

10月3日的第四場綜合討論則聚焦「香港與大灣區的個人資料保護與數據安全」，由恒生大學宋昭勛博士主持，報告涵蓋了大灣區跨境數據流動政策比較、特別是思考香港在中美個人資訊保護與合規中的角色，以及數據安全規則的區域實踐與思考。會議最後，由中央財經大學邢會強教授致閉幕詞，恒生大學蕭旭泰教授致謝，強調跨界合作與多方參與對推動可持續數據治理的重要性。

與會者認為，數據技術的創新不僅為資訊產業帶來機遇，也對新聞傳播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同時，研討會呼籲建立跨校、跨區域及跨學科的合作平臺，分享最佳實踐，推動法律、技術與倫理的融合發展，以構建更安全、可信且可持續的數碼環境。

此次研討會不僅促進了學術界與業界的交流，也為未來個人資訊保護、網路私隱治理及數據倫理提供了新的思路與實踐方向，彰顯香港在數碼治理與跨境合作領域研究的影響力。

本地考生何去何從

並對競爭加劇表示關注。凌同學坦言：「會有一點擔心，始終內地學生若透過Jupas聯招升學會令聯招整體競爭增加。」不過他也表示沒有辦法，清楚意識到這是香港的考試制度，個人無法改變，只能接受這個現實。

關注考試公平性

面對升學競爭加劇，王肇枝中學的周老師，亦解釋對中學規劃及老師的影響。周老師提及：「在較發達的亞洲地區，升學競爭一向屬於常態。」即使沒有內地學生報考，本地學生要透過文憑試升讀大學，向來也面對激烈競爭。他反而比較關

注相關情況會否影響文憑試的公平性：「本地學生在多個科目均須完成校本評核，然而外地考生是否同樣履行這些要求？另外，部分教育機構的商業操作是否有適切規管？若發現有違規行為，政府部門能否及時採取行動？若情況持續，供求關係的變化確實可能導致本地考生較以往更難升讀本地大學。」

在此趨勢下，學校亦要隨之改變應對。周老師認為在教學及升學輔導方面，主要的改變是學校需要更關注各大院校的最新收生數據，協助學生在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制訂更具前瞻性的升學策略。同時，校方也會進一步提醒學生將升讀大學

視為基本目標，並在激烈競爭下更加努力學習與自我裝備。學校在教學與輔導間取得平衡也十分重要，此趨勢促使學校調整教學策略，以應對新的挑戰。

周老師認為，「國際化」的關鍵在於如何界定其涵義。他表示：「DSE的國際化不應僅僅是吸引更多考生，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的制度，以確保所有考生都能在公平的環境下競爭，並保證考試的質量和公信力。」因此，DSE的下一步仍有多條路可走：「是朝向真正具有國際認受性的考試制度邁進，還是維持以本地競爭為主的定位？對於DSE應否國際化，我們亦有待觀察。」



■被 X JAPAN 團長指控視覺相似的畫面。(來源：網上截圖)

數字創意：

抄襲與致敬 的界線模糊



■樂隊 X JAPAN 主音 TOSHI 於 Kyoto Sports Valley 現場演奏《紅》的形象。(來源：網上截圖)

2025 年 8 月 8 日，日本人氣動畫作品《膽大黨》捲入抄襲爭議引起網民熱議。該作品第 18 集中有橋段出現對日本搖滾樂團 X JAPAN 的致敬元素，但動畫公司未有知會 X JAPAN 樂團成員，其後樂團團長於社交媒體上連續發文，質疑《膽大黨》動畫抄襲樂團經典作品《紅》。推文一經發出，迅速在日本網絡上引爆輿論。這些日漫動畫，正是目前熱門的「數字創意」作品。「數字創意」是一個結合了科技與創意的概念，泛指人們利用數位科技、工具與媒介來構思、設計、製作或表達創意內容，目前社交媒體上的內容其實都可被稱為數字創意。科技進步一日千里，AI 等新技術讓人們更快速和低成本地展開數字創作活動，但問題是——到底抄襲和致敬之間的界限應該如何區分？

記者：何惠君 甄竟希

AI 橫空出世 「創作」門檻變低

2025 年 3 月時，OpenAI 推出由最新模型 GPT-4o 為驅動的新影像生成器，時任執行長 Sam Altman 把自己在社交平台 X (舊稱 Twitter) 上的個人頭像換成了「吉卜力」風格，隨即於網上掀起一波以 AI 製作吉卜力風格的圖片的熱潮，爭議亦接踵而至。

就讀動畫製作及視覺效果的楊同學表示，「有用過人工智能進行創作」，但「用家需要具有清晰的表達才能使用人工智能精準生成自己想要的內容」，但他亦認為使用人工智能不屬於創作，「充其量叫做電腦操作員」。而就讀動畫及數碼藝術的陳同學認為「人工智能會降低創作門檻，優秀的原創作品難以進入大眾的視野」。



■ OpenAI 行政總裁 Sam Altman 將自己的 X (Twitter) 頭像變成「吉卜力風格」引起熱潮 (來源：Sam Altman X)

版權法：「只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

在大眾認知中，抄襲與致敬之間的界線比較模糊，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胡欣立博士表示：「公眾通常對抄襲的理解比較寬泛，而法律定義則更為精確，版權法通常遵循『只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的原則。這意味著許多公眾認為是抄襲的行為，比如僅僅使用他人創意或構思，在法律上可能不構成侵權。」

■胡欣立博士：「版權法只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來源：胡博士提供)



模仿藝術風格不構成抄襲

事實上，法律為保障創作者的權益，早已對抄襲等侵害知識產權的行為作出明確指引。以《膽大黨》事件為例，胡博士強調，「如果對新作品的使用並非簡單地再現原作，而是為了評論、諷刺、戲仿、或賦予全新的意義，這類或稱為『轉換性使用』(transformative use)，在司法實踐中可能構成合理使用，而不構成侵權。」雖然動畫中樂隊及其樂曲「表達」上都具有《紅》以及 X JAPAN 的影子，但《膽大黨》製作組在道歉聲明中提到，「該首歌曲是製作團隊基於對他們尊敬的 YOSHIKI 和 X JAPAN 所懷抱的熱情所展現，一方面也是想要藉由這首歌曲的演出，將動畫的故事與場景進一步結合，打造更勝於以往的作品。」若根據此聲明作判斷，《膽大黨》的使用並不屬於「簡單地再現原作」。當然，事件最後未上升到法律層面，難以斷言《膽大黨》是否屬於「轉換性使用」而不構成司法實踐中的侵權。

而吉卜力事件，除了有大量網友「跟風」製作 AI 圖片，亦有不少人認為這類行為侵犯了吉卜力工作室動畫著作權。對此，日本文部科學省戰略官中原裕彥曾表示，利用 AI 製作與吉卜力工作室動畫相似圖像的「吉卜力化」問題，以及是否符合版權法，「最終將由法院裁定」。他補充說，「如果只是風格或創意相似，則不視為侵犯版權」。也就是說，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會受到著作權的保護，但「吉卜力

風格」則不然。

智能平台責無旁貸

要避免出現類似爭議，AI 平台應承擔責任。早前，特區數字政策辦公室於 4 月 15 日公布一份《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及應用指引》(下稱《指引》)。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開發者、服務提供者和服務使用者實用指南」部分，提及到技術開發者應遵守承擔的責任，即「道德規範的模型開發、技術保障措施的落實、持續監督與監察、數據權利管理」。

《指引》建議技術開發者應成立具備良好架構的生成式 AI 開發團隊，並採納健全的工作實踐，同時應恪守重視知識產權保障的原則，並兼顧數據完整性與中立性等其他關鍵因素。

用家應有法律意識

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高級講師陳家樂博士提到：「究竟 AI 生成的產物是否創作的一種？因為過往的藝術創作都需要時間去訓練和創作，但到了今時今日，只要給它 (AI) 一些明確的指示便能生成出作品來。這種指令技巧可能也是創作訓練的其中一個模式，那麼由 AI 生成的產物可能也是創作的其中一種方法，要學習如何合理使用。」要避免爭議出現，用家亦需要承擔一定責任。《指引》亦有提出使用者應要承擔的責任並尊重知識產權，



■陳家樂博士：「AI 生成也可能是創作的其中一種方法」(來源：香港恒生大學官網)

包括「道德使用、意識提升與自我控制、社群保護、內容核實」。

■過去三年本港學童自殺數字高企。
(電影《年少日記》預告片)



教室外：依賴社會修補的生死課題

近年生死議題備受社會關注，從《年少日記》到《破地獄》，類似話題透過本地電影引起社會熱烈討論。電影內容切入生死議題，衝擊社會多年來未有重視的生死教育發展。2025 年度施政報告提出將中學「三層應急機制」恆常化，以加強支援有需要學生。有從事生死教育的職工指，政府多年來忽略青少年生死教育議題，是導致學生無法及早預防精神健康問題的原因之一，認為本港文化藝術乃至社會早已醞釀好生死教育的土壤。

記者：林冠壹

立法會《數據透視》顯示過去 10 年學童自殺數字仍然高企，從 2013 年至 2023 年間攀升接近三倍，至 2023 年達到 32 宗，佔當年香港整體自殺數字約 3%。雖然教育局在 2021 年修定《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的生命教育範疇，開始提及生死教育內容，但對比其他章節，生死教育仍屬少量及模糊的概念。

目前本港學校以校本形式管理學生課外活動內容，意思是以學校為本自行管理教學課題，其中大多數中學一直以生命教育、生涯規劃等方式讓學生聚焦於面對成長、職業選擇等目標，相反關於死亡的課題多年來卻鮮少可見。

談及生死是禁忌嗎？

已經停辦的 MWYO 青年辦公室在 2024 年曾與香港生死學協會共同發表《香港中學生看生死研究》報告，並透過問卷和訪談調查中學生的生死觀。報告發現，香港學生傾向於接受死亡，並在「自然接受」死亡中取得平均分最高，達 3.71 分。MWYO 青年辦公室研究副總監黎卓然在調查中曾指出，現時香港學生認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但仍然有部份學生對死亡產生擔憂、逃避等。他還指出，學生在接觸死亡議題仍偏向保守，反映香港在生死教育方面仍較為缺失。

教育政策欠奉或為滯後主因

「未知死，焉知生？」生死教育是指透過引導學生思考生命的意義，增進他們對生命的期待和對死亡的接受，並透過了解死亡，反省生者應如何生活。香港生死學協會總監梁梓敦認為，「社會正在慢慢轉變，年輕一代對生死話題的接受度其實比想像中高，反而阻礙往往來自上一代的忌諱」。

從事生死教育近 20 年，梁梓敦直言政府推進生死教育明顯滯後，「生死是人生必經階段，但教育制度卻鮮有提及」，「現行教育過分強調『獲得』成就，而忽略『失去』也是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批評教育局不能僅以「已提供配套」為由停止改進課程。他認為本港生死教育要完全專業化，需要具體的執行方案和資源投入，例如建立專業認證資格與成效評估機制等，否則改進只會流於形



■梁梓敦指學校教育仍欠系統性地納入生死教育。
(林冠壹攝)

「失去教育」淡化生死話題

過去梁梓敦曾提出「失去教育」的概念，將討論範圍擴展至人生中各種「失去」的經歷，嘗試以此降低生死議題的沉重感，他舉例中學生面對文憑試後與師友分離的情景，正是體會「失去」的契機，強調這種方式能淡化課程對死亡的忌諱，讓生死教育更易被接納。

社會推動苦無專業把關

禮儀師、生死教育講者兼「一切從簡」社企創辦人伍桂麟博士指，「做生死議題與其他學科不同，他不能絕對理性，因為這是一個情理兼容的課程」。他認為一些本港教師不了解生死教育的基礎，甚至可能因此造成危機，「有時我會發現部份生死教育活動設計太花巧，或刻意引導出參與者的悲傷情緒，甚至將危險的情緒加在學員身上」。

伍桂麟舉例曾收到學校諮詢讓學生體驗「馴棺材」，他批評這些內容可能會對學生有危險，又指現時香港生死教育活動內容豐富，但背後無專業把關，引發嚴重隱憂。

對於推動年輕一代的生死教育，伍桂麟嘗試以種下種子比喻生死教育發展，「必須要先讓生死教育的種子在年輕人心中萌芽，才能讓年輕人在生死議題中有所成長」，生

死教育的目的或在於「當學生有這些自殺念頭的時候，能讓他們有多一份考慮」。

社區藝文醞釀多年

現時生死教育課題主要依賴社會參與，包括由非政府組織或慈善組織自行籌辦生死教育活動，或文化藝術界參與創作及發表生死教育相關內容。其中電影《年少日記》就曾引起社會討論生死話題的熱潮。

在社區活動方面，非牟利公營機構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後稱華永會）是目前香港生命教育的主力之一。華永會主要向社會大眾推動生命教育，傳遞正向的生命信念，該機構自 1991 年起資助本地非牟利團體推行超過 3,500 個有關推動生命教育的慈善項目。



■卓亦謙指出電影製作「多只可以展示態度」。(林冠壹攝)



■得獎繪本《一直陪著你》向兒童解釋父親離別。(林冠壹攝)

《年少日記》開啟生死對話

卓亦謙導演憑《年少日記》奪得多個電影獎項，電影直接傳達學童自殺訊息。他指當時亦擔心會有模仿效應，「當時甚至有不少年輕觀眾在看完電影後激動地向我分享自身經歷」。他坦言創作時完全沒有預期作品會成為生死教育的載體，並指自己也是經歷不同活動與訪談邀約才認識到生死教育，認為由拍完這套電影開始，「承擔了一份社會責任」。

卓亦謙認為，討論生死話題應該根據不同年齡段，用適當方式談論生死，而非刻意避諱，「否則當你第一次面對祖母去世時，會和家裡一樣不知所措」。他強調這些討論

不應以「說教」形式出現，認為每個人對生死觀念不盡相同，「以開放態度引領思考，而非給出確定的答案」。不過他亦坦言電影上映後，香港學童自殺率並未因此減少。

討論推動公共話語空間

香港恒生大學藝術及文化傳播課程副主任陳藹欣博士指，「電影作為文化載體，提供空間去表達、理解和療癒創傷，以真誠態度呈現生死話題，能夠引發公眾對相關議題的討論與反思」。她留意到除了電影本身，「觀眾在社交媒體分享、寫影評及參與討論，能夠形成集體記憶與情感連結，進一步推進生死教育與心理健康的公共話語空間」。

CCD攝影機復興 引爆懷舊消費



■深水埗某相機店售賣各種 CCD 相機。(甘蕊雯攝)

每逢節假日，在深水埗的相機店前，常常聚集不少對數位單反相機（CCD）充滿興趣的年輕人。各式各樣的 CCD 相機，即便外觀破舊、按鍵老式，卻依然吸引著年輕消費者的目光。CCD 機仿佛在訴說著自己獨特的歷史，更引爆了一場懷舊消費熱潮。

記者：甘蕊雯 鄭樂瑤 陳珈穎

電子古董時代輪迴

CCD（電荷耦合元件）在千禧年代曾風靡一時，是當時許多年輕攝影師的心頭好。然而，隨著互補式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技術崛起，CCD 相機因其高耗電和高生產成本而逐漸被市場淘汰。但是今天，隨著 Y2K（千禧年時代）文化回潮，CCD 相機再次受到年輕人的青睞。這股懷舊情懷讓許多年輕攝影師重新審視這些曾經被時代遺忘的設備，並使之成為新一代潮流的象徵。

在社交媒體上，年輕攝影師分享著用 CCD 拍攝的復古風格照片，這些作品常常帶有明顯的顆粒感和低飽和度，讓人感受到一種懷舊氛圍。大學生阿明（化名）表示，他使用 CCD 相機主要是為了拍攝校園活動和朋友聚會。他說，「我喜歡用 CCD 相機拍攝，因為它能捕捉到獨特的氛圍，照片的顆粒感讓我感覺更有故事性。」阿明會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這些照片，吸引朋友的注意。另一位大學生小華（化名）則強調學習攝影技巧的重要性，「我覺得攝影是一種藝術，使用 CCD 相機可以讓我更專注於構圖和光影。」她認為，雖然智能手機拍攝方便，但用 CCD 相機挑戰自己更具意義。

外觀與設計吸引

CCD 相機的復興也與其多樣的外觀設計



■不同攤檔的相機鋪滿枱面。(陳珈穎攝)

密不可分。許多現代數碼相機過於注重功能，反而忽略了設計的多樣性。年輕人將 CCD 相機視為拍攝道具，外觀成為選購時主要考量。特別是那些形狀獨特的「方塊機」，因其便攜性和時尚感受到青睞。年輕攝影師阿偉（化名）分享了他對外觀設計的看法，「我喜歡 CCD 相機的復古外觀，這讓我在拍照時感受到一種獨特的氛圍。」阿偉提到，他會選擇各種顏色和造型的 CCD 相機，這些機型不僅展現了個性，也能成為社交場合的話題。

社交媒體促進

隨著社交媒體興起，年輕攝影愛好者能夠通過精美的照片展示生活，吸引更多的關注和互動。平台如 Instagram 和 TikTok 已成為年輕人表達自我的主要渠道，這不僅促進了攝影文化交流，也讓 CCD 相機的使用更加普及。年輕人對於自我表達的渴望，使得這種復古設備再次成為時尚潮流的一部分。年輕攝影師婷分享道：「我覺得用 CCD 拍攝的照片更有情感，特別是在一些特別的場合。」她提到，這種獨特的影像風格讓她在朋友圈中獨樹一幟，也讓她的作品更容易引起共鳴。

內地消費者引領

近期，內地消費者頻繁來港購買 CCD 產品引起了業界關注。香港的攝影市場以其更為



■相機店展示各種 CCD 相機。(鄭樂瑤攝)

豐富的品牌選擇和相對優惠的價格，吸引了大量內地攝影愛好者專程前來選購高品質設備。我們訪問了位於深水埗的一家相機店的老闆。他指出，這一趨勢不僅反映了內地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重視，也顯示出他們對香港市場的信任。他表示：「香港的攝影市場提供了多樣化的產品選擇，許多內地攝影愛好者選擇來港購買 CCD 相機，以確保得到更高質量的設備。」

一位來自內地的旅客阿榮（化名）提到：

「我來香港購買 CCD 相機是因為這裡的選擇多，且品質有保障。在內地，假貨問題相對嚴重，經常會遇到非正品產品。」阿榮強調，香港的專業攝影店提供了詳細的產品資訊和完善的售後服務，讓他對購買過程比較有信心。

自我表達與文化認同

曾先生是一位攝影師，他說：「我對 CCD 相機的熱潮感到振奮。這些相機雖然技術上不如當今的數位設備先進，但它們擁有獨特的顆粒感和色彩表現，能夠捕捉到一些現代數位相機無法表現的情感。我看到許多年輕攝影師透過 CCD 相機拍攝，這股熱情不僅是對於攝影技術的追求，更是一種文化的反思。他們在使用這些相機時，會回顧過去的攝影技巧，並將其與當代的創作手法結合，讓每一張照片都充滿故事。我相信，這種對於過去技術的回顧和再創造，正是當代攝影文化的一部分。」攝影不再僅僅是一種技術，更成為一種文化表達的方式。

文化研究專家何老師認為：「CCD 相機的復甦是文化與技術交織的一個重要現象。年輕人對於這些相機的熱情，不僅僅是對於舊時代的緬懷，更是對自我表達和文化認同的探索。他們在挑選這些外觀破舊的相機時，似乎在尋找一種與數位世界截然不同的體驗，這樣的選擇充滿了對於歷史的敬意。」

傳新報編輯委員會名單

執行副總編：蔣雨軒 甘蕊雯

版面編輯、記者：鄧正弘 唐吉祥 張綺倩 黃樂穎 李承晉 蔣雨軒 蔡欣琳 廖若彤 何惠君 甄竟希 林冠壹 甘蕊雯 鄭樂瑤 陳珈穎